

孙中山基金会丛书

· 论 集 ·



孙中山研究 和史料编纂

黄彦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孙中山基金会丛书
· 论 集 ·

孙中山研究 和史料编纂

黄 彦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孙中山基金会丛书论集系列编委会

主 编：刘望龄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庆忠 沈茂骏

莫世祥 桑 兵



作者近照

“孙中山基金会丛书”序言

几年前，当孙中山基金会在广东成立时，便曾有编辑出版丛书的设想。如今，经过本会同人的努力，在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和配合下，本丛书终于在孙中山先生诞辰 130 周年前夕开始和大家见面了，这是值得高兴的。

推动孙中山学术研究，是孙中山基金会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责之一，也是本会章程所明确规定的。因此，出版有关孙中山的学术研究成果，就将构成为“孙中山基金会丛书”的主要内容。

大家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最优秀的代表之一。100 多年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孙中山先生早年赴夏威夷、香港求学，在澳门、广州行医。他目睹祖国在清朝政府的腐败统治下，屡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对外丧失主权独立，对内没有民主自由，国家衰弱落后，人民贫穷困苦，旅外华侨蒙受歧视迫害，而立下救国救民的弘愿。他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组织民主革命团体，创立三民主义学说，奔波于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奔波于日本、越南、马来半岛、暹罗（今泰国）、美国、加拿大及西欧各国，广泛团结国内各

阶层人民、各地侨胞和联络外国友人，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在1912年倾覆清朝统治，废除封建帝制，创建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制国家。随后，他同帝国主义支持的中国大小军阀进行不懈的斗争，并制订出复兴民族经济的建设蓝图。他热情支援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要求消除国际不平等关系，主张在全世界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战争的大同社会。在他晚年，又积极联合中国共产党和扶助工农运动，为推进国民革命和实现国家统一而工作到最后的一息。一言以蔽之，孙中山先生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统一和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终生，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他在长期斗争中对革命和建设理论的创造性探讨，也给后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遗产。

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人格还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对祖国充满热爱，对振兴中华倾注巨大热情，又深切关心世界人类的共同进步。他襟怀豁达，对民众及自己的部属谦和仁厚，并善于团结国际友人。他富有开拓精神，勇于进取，百折不挠，对正义事业坚贞不移。他富有献身精神，为革命工作鞠躬尽瘁，从不计较个人安危得失，不谋私利。他善于顺应世界潮流与人群之需要，研究历史与现实，好学不倦，思想上随时代的进步而不断进步。凡此种种，莫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性格和崇高精神。

正因如此，我们因中华民族拥有孙中山先生这样一位杰出人物而感到自豪，一直对他怀着深深的敬意。中华民族过去曾为人类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今日也正以我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工作，致力于建设和统一祖国，并希冀在21世纪为人类社会的繁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加强孙中山学术研究，对他所留下的思想遗产给予科学总结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进一步弘扬他

那热爱祖国、振兴中华、关心人类共同进步的伟大精神，这对于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它的作用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任何历史人物都是时代的产物，孙中山先生也不例外。他的思想和实践活动，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条件，与当时的许多历史现象和历史因素密切相关。所以，研究孙中山就不得不同时研究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研究与他有关的各种事件、人物、派别、阶级、社会思潮、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国际关系等等。唯有这样，才能对孙中山先生的历史表现及其作用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由于时代条件所限制，他的思想和实践活动难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这并不奇怪。历史人物的成就与不足都必须置于研究者的视野之内，并给予科学的说明。那种脱离历史实际，对孙中山先生或则故意拔高和溢美，或则妄加菲薄和苛求，都是不恰当的。

“孙中山基金会丛书”所出版的孙中山学术研究成果，包括专著、论集、资料、译作四个系列，并分别成立编委会，在孙中山基金会统一领导下负责组织稿件和编审工作。为利于深化和拓展孙中山研究，要求出版的论著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倡潜心钻研和认真探索，提倡勇于创新 and 自由争鸣；而专题资料汇编，则要求内容完整和史料价值较高；同时，准备陆续选择若干在国际上影响较大的外文著作或珍贵的外文资料。除此之外，本丛书还拟根据今后的需要，出版其他内容的书籍。我们希望，这套丛书将能够长期出版下去。

本丛书由孙中山基金会负担出版费用。在这里，谨向海内外热心提供赞助的朋友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孙中山基金会会长 歐初

1996年8月于广州

从孙中山研究说起*

(代 序)

《广东社会科学》自创刊以来一直坚持开辟“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专栏，这在我国同类的综合性社会科学杂志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除此之外，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论丛》、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孙中山研究》等专门性刊物以及不少有关孙中山的专著和资料集的出版，都反映了我们广东作为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对于孙中山研究工作的重视和提倡。

孙中山是我国的一代伟人，也是受世人景仰的国际政治家。孙中山的思想曾经代表了近代中国最进步的社会思潮，他的历经数十载的政治活动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民主自由的艰苦的斗争历程。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对后来中国的发展和中外关系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至今天这种影响依然存在。用不着多加说明，继续坚持和进一步发展孙中山研究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 本文为纪念《广东社会科学》创刊5周年而作。

海峡两岸、世界各国研究孙中山的人相当多。在中外学者长期的共同努力下，孙中山研究作业已取得较高的成就。国内外有关孙中山研究的出版物数量之多，是其他历史人物很难望其项背的。然而，由于孙中山思想的丰富性及其经历的复杂性，由于他的活动牵涉到许多事件、人物、派别和国家，由于他一生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变动频繁，同时也由于分散在各地、各国的历史档案等原始资料还不可能一下子就被研究者所充分掌握和利用，因此，对孙中山的研究又远远没有到顶，许多研究领域有待开拓，许多历史内容有待充实，许多研究结论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或修正。即使是一些史料基本完备并已有不少人涉足的课题，由于研究者们把握历史本质的主观认识能力并不可能没有局限性，同样可以给有志于深入研究的后继者留下充裕的余地。

像每一门科学一样，历史科学的发展有赖于研究者的独立钻研和认真探索，在前人已达到的研究成果之上提出新的、更准确的、更完整的科学见解。对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历史人物的研究也是如此。如果限于重复别人的研究成果，满足于现成的结论，仅是以增减个别的历史实例、改变文字表述方式来发表自己的论文或著作，那么，这种“炒冷饭”式的成品严格地说并不属于科学研究之列（普及读物则另当别论）。科学研究贵在创新。创新之所以是可能的，在于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任何人的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都毫无例外地要受到历史条件以及各种具体因素所制约，掌握客观真理具有一定的限度。正因如此，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自然会从详细占有史料出发，对前人研究所得出的任何结论用批判的态度加以认真审查，看看这些结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历史事实，是否真正能够从诸历史现象间的联系及其总和中作出科学的抽象。审查的结果不外乎有两个：一

是以旧的正确结论作为历史研究的新起点，一是以新的正确结论代替旧的错误结论。至于所谓正确的或错误的结论，亦即学术研究中的是非问题，言人人殊，却不是能够一时判断准确的。唯有创造一个利于百家争鸣的良好气氛，鼓励大家在刊物上发表各种不同的见解，讨论愈是深入彻底，就愈能明辨是非，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我相信，孙中山研究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会获得日新月异的发展的。

这里还须附带指出：在研究中能真正有所发现和提出新的科学见解，必属于那些愿意付出艰辛的劳动、脚踏实地、潜心钻研的人们。不学无术、投机取巧、哗众取宠的种种表现都是科学的敌人。马克思的下述名言始终是我们的座右铭：“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最后，衷心祝愿《广东社会科学》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专栏越办越出色，为推动孙中山研究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原载《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孙中山基金会丛书 1996 年出版书目

刘曼容著：《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专著）

李吉奎著：《孙中山与日本》（专著）

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专著）

金冲及著：《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论集）

张 磊著：《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论集）

黄 彦著：《孙中山研究和史料编纂》（论集）

林家有著：《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研究》（论集）

姜义华著：《大道之行——孙中山思想发微》（论集）

邱 捷著：《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论集）

汤锐祥编：《海军护法史料汇编》（资料）

广东省档案馆编译：《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译作）

目 录

从孙中山研究说起（代序）	（ 1 ）
孙中山早期思想的评价问题	（ 1 ）
谈谈孙中山致郑藻如书	（ 14 ）
孙中山和檀香山兴中会的成立	（ 29 ）
孙中山改组革命团体的一次尝试	
——从兴中会到中华革命军	（ 42 ）
兴中会研究述评	（ 56 ）
论孙中山在反清革命时期的领袖地位	（ 70 ）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的日子里	（ 91 ）
论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思想	（ 113 ）
论孙中山的开放思想	（ 135 ）
关于世界新秩序的构想	
——论孙中山的“世界大同”观	（ 153 ）
社会主义现实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	（ 208 ）
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几个问题	（ 226 ）
介绍《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 263 ）
介绍《孙中山选集》校订本	（ 300 ）
关于《孙文全集》的编辑构想	（ 309 ）
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调查报告）	（ 400 ）
后 记	（ 416 ）

孙中山早期思想的评价问题

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发展道路，有必要考察他在兴中会成立前的思想活动。本文打算就这个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请同志们指教。

孙中山开始用文字表达他的思想观点，是1885年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失败以后。在这场民族危机中，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暴行、封建统治集团的昏庸怯懦以及人民群众的英勇抗争，给他上了很好的一课。战后不久他到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曾写了不少论文投寄香港、澳门、上海的报刊发表；毕业后行医期间，仍继续有作品问世。应当说，如此旺盛的写作热情正是经过中法战争而日益激发起来的爱国情愫的有力表露，而作品所表述的主张则是人们判断早期孙中山的基本思想倾向的最好根据。这些著作保存下来的共三篇：1889年致香山县籍退休官僚郑藻如书；1891年前

后写的论及农业的文章，后经郑观应酌加修改，以《农功》为题辑入《盛世危言》；1894 年上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书。孙中山的这些作品，乃是当时改良主义思潮的带有个性的表现。

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在中法战后愈益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它是正在生长的民族资本主义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十分幼弱，新式企业的主要投资者还没有完全从旧剥削者阶级分离出来，民族资产阶级刚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由于分工关系重新分裂为各种不同的集团”的过程尚未完成）；与这种情况相适应，新企业家们只能通过其代言人，通常是采取上书请愿方式，提出一些不触动现存统治秩序的资产阶级性改革主张。这种温和而软弱的改良主义，就其主张的内容来说是伴随着新经济的出现而出现的新思想，它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谋求国家富强的主要手段提了出来。孙中山置身于这种进步潮流之中，尔后又把改良作为走向革命的阶梯，正是这位年青爱国者值得人们敬佩的地方。事实上，古今中外曾有许多卓越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当他们开始从事理论探索和政治活动时，都不得不受到既往历史所创造的物质生活条件和阶级条件的制约，不免要受到同时代主要的进步思潮的影响；孙中山也是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得好：“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不能使思想独立化，而不顾产生这些思想的阶级和条件^①。如果把孙中山描绘为天生的革命家，把他当成脱离特定条件和站在时代潮流之外的超人，就会歪曲历史真相。

孙中山想通过“求知于当道”以贯彻他的救国主张，是与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3 页。

同改良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者郑观应等人密切交往而接受他们的影响分不开的。曾在通信中与孙中山“研讨改革时政意见”的郑观应，原是李鸿章手下的重要洋务人员。郑藻如是郑观应的同里宗兄，1885年退职后在乡间实行“兴蚕桑之利、除鸦片之害”等改良措施，又参与修订《盛世危言》，该书的若干观点还是他添进去的——孙中山致书给他，并非偶然。郑观应不仅介绍另一个著名的改良主义者、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王韬与孙中山见面，从文字上对《上李鸿章书》加以润色；而且在1893~1894年间曾策动过格致书院学生就各项改良主张上书“当道”；据此看来，他策动孙中山向李鸿章投书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当时李鸿章推行所谓“自强”新政，并以谥“时务”著称于世。1889年李鸿章成了香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在写给该院的信中大谈他如何“珍视”“西方科学”。1892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该院教务长康德黎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盛赞李鸿章“信仰科学”的态度，甚至把他推崇为“中国之俾斯麦”。^①在这样的氛围中，孙中山自然对李鸿章心存好感，早有上书“指陈时事”的打算，认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中国……的危亡”^②。过去史学界曾有这样的意见，或则认为孙中山投书李鸿章只是一种革命策略，其目的在于“窥探清朝虚实”，或则认为此举不过是孙中山在鼓吹和准备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思想“摇摆”，这些看法是不妥当的。

不过，孙中山毕竟与一般来自上层并享着很大声望的改良主义者有所不同。他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童年参加劳动，对农

① 以上载当年香港《德臣西报》(The China Mail)，转引自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第15页。

②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建国月刊》第1卷第2期。

民大众抱有真挚的同情心；他的家庭成分后来朝向华侨资产阶级转化，本人则还是一个长期在西式学校念书的下层知识分子。像这样的出身、经历和社会地位，使得他具有重视发展农业的思想特色，行动上又很注重实践。

在《致郑藻如书》中，孙中山把发展蚕桑业列为所谓“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的三项措施中的首位^①。他假期归乡，除为老农介绍科学选种、施肥等农学知识外，还对土壤进行实地考察，试验种桑。他设想过去要在香山全县提倡养蚕种桑，取得经验后著成专书，向各地推广；后又计划到法国留学，“考察蚕桑新法，医治蚕病”。孙中山如此重视蚕桑业，一方面是为了“广其农利”，增加农民收入；另方面则具有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和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意义。自从1872年侨商陈启源在南海创办第一个机器缫丝局以来，顺德等县相继仿办，至1887年顺德已开设42家，缫丝业成为当时全国民族工业中的一个主要部门。粤丝输出量随之激增，每年达到24000余担，价银约1600万元。^②中国向来以丝茶为出口大宗，这对于限制洋丝输入，改变外国商品倾销所造成的入超局面，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孙中山热心提倡蚕桑，正反映了民族缫丝工业的发展需要，为它扩大再生产提供原料。

在《农功》和《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特别强调要发展农业科学，使用农业机器。他尖锐地指出中国农业极端落后，人口日增而土地不能日广，如果不设法提高农作物产量，“饥馑之患”是不可避免的。他主张大力发展土壤学、化学、物理学、动植物学、农医学等等，认为“农学既明，则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

① 《孙总理致郑藻如书》，《濠头月刊》第14、15期合刊。

② 陈启源：《蚕桑谱》，光绪三十四年广州奇和堂药局刻本，第1—2、4页。

物”。还提出应从外国进口农业技术设备，“购其器而仿制之”，普遍推广机器耕作，这既可大大提高生产率，又能减轻农民劳动强度。他认为“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向李鸿章建议开设农师学堂，举办农艺博览会，并提出让他先到西方各国考察农业生产情况，“回华后可再行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①。

《上李鸿章书》还谈到了发展工商业和教育等问题。

在发展工矿业问题上，孙中山同样强调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采用机器生产。他把发展自然科学提到了“生民根本之务”的高度，并指出应用先进生产工具对于振兴工业和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机器巧则百艺兴、制作盛，上而军国要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财力，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事所不成之物。”他还提出，在增加生产财富的同时，必须注意节约，反对浪费，“若不节惜物力，亦无以固国本而裕民生也”。

在发展商业问题上，孙中山对统治者的苛暴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过省有关，越境有卡，海口完纳，又有补抽，处处敛征，节节阻滞，……徒削平民之脂膏，于国计民生初无所裨。”他强调指出，英国到处掠夺殖民地，各国列强“凭凌中夏”，使我国“利权皆为所夺”，都凭借着雄厚的“商力”；而中国当局实行“抑商”政策，使生产物难以流通，财源短绌，兵饷无从筹措，便只好任人宰刈。故要反对外国侵略，就必须“保商”。同时，又指出要繁荣商业，还应大力发展内河航运和修筑铁路。

孙中山十分重视改革旧教育制度，为国家培养大量建设人才。

^① 《上李傅相书》，《万国公报》月刊第69、70册。以下引文同此。